

# 『和平運動』與汪派投敵（上）

樂 怒 人

## 抗戰採訪錄第七章

### 擴大派與不擴大派

武漢會戰後，敵我作戰的態勢已如上述外；我們不能不記載另一面事實的重要演變。即中日戰爭後的所謂『和平運動』，以及汪精衛變節求和的經過概要。

本來，在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我國當時曾希望就地解決，因為中央政府將完成『攘外必先安內』的最高國策，而且對日本抗戰的軍事準備也尚須三五年才得完成。不但中央當局有如此苦衷，即是社會領袖，如在北方的文化學術界領導人物，在教育界有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之，在新聞界有天津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等，都曾經公開或非公開表示對日抗戰尚非其時。

『七七事變』後，蔣委員長在廬山邀請全國名流的座談會上，胡適之即曾發表意見，仍主張國防教育是常態教育而非特殊教育，教育中心目標應為國家高於一切，他並提出天才救濟和教育獨立的問題，處處以國家百年樹人大計為重。事變前，全國民情沸騰，呼籲政府抗日作戰，有的甚為表示『不惜一戰』，『寧為玉碎，勿為瓦全』。張季鸞即曾在大公報上發表社論，反對不惜一戰的論調，主張謀定而後動，準備好了，才發動

全面抗戰；因為他認為全面戰爭一開，關係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不能不特別萬分慎重，絕不可意氣用事。他有名言道：『要作有機體的抵抗，不作無機體的被打！』

因為這兩位民間領袖，深知當局抗日苦衷與決心，在忍辱負重，爭取時間和加強準備，以期收復失地，澈底解決中日間糾紛，打垮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但當年一般民衆那知政府此種苦衷和決心，只以為日本侵略欺侮如此的厲害，還不抗戰，更待何時？但政府方面又不能公開說明準備抗戰的隱情實況，在野人士如胡張等也只有暗示和間接解釋。可是，日本軍閥着着進逼，不願我們有充分時間準備；同時中國共產黨也利用了情勢，在第三國際的指示下，盡可能挑起煽動全國的抗日情緒，造成戰爭的局面，他們就可以先圖生存，繼求發展，終而奪取政權，赤化中國！

另外，在敵國國內，蘆溝橋事變後也分成爲『擴大派』與『不擴大派』的爭執；但不幸急進的軍閥當權派，擴大了戰爭，以爲即令與中國全面作戰，也不過三個月即可獲致決定性的勝利，一如過去『一二八』上海戰爭，和長城各口戰爭然，又可以逼迫中國再度求和，簽訂屈伏的條款。那知中國已被迫採取長期抗戰的決策，不論

平津、淞滬、南京，甚至武漢被日軍攻佔，決不接受日本的所謂『和平條件』，依然堅持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

至此，日本戰既不能勝，和又不能成，在中國大陸上已深陷戰爭泥淖；同時，在國際情勢上，一面遭遇美英的反對，一面又受到蘇聯的威脅，可謂焦頭爛額，狼狽萬分。

在這種愈趨嚴重困難的情勢在發展的當中，敵人汲汲於要結束中國的戰爭，企圖利用國際情勢，與德意東西配合，實行她的『北進』攻蘇聯，『南進』排英美的國策；於是，妄想採取『以華制華』政策，另外扶植一批『親日』的傀儡，建立政權，分化中國抗日的團結力量，以達到勝利結束中國戰爭的陰謀。

原來，在全面戰爭還沒有爆發前，亦即蘆溝橋戰火燃起，而上海尚未發生大戰這一段時期，關於停戰言和的工作，已經分成兩面在進行，殊有從頭一敘的必要價值。

以友邦外交界爲一路的調解工作，正在東京積極展開。七月十三日，英國駐日代辦James Dods曾往訪美駐日大使格魯Joseph C. Grew告訴他說英外相艾登 Eden 已召見美駐英大使 Robert Bingham，詢其向美政府探聽，是否願

意與英國聯合調解中日間戰事，以駐東京、南京大使等負責進行？英大使並向格魯表示，日本政府仍擬避免戰爭，但求不失『面子』，（原文爲：Loss Of Face）以便結束蘆溝橋一帶的戰事。格魯大使即表示願意向華盛頓請示後，再商調解的辦法。

殊不知早一天前，日本駐美國大使野村吉三郎，已經前去謁見了國務卿赫爾 Hull，向他說明蘆溝橋戰事的情形。赫爾當即表示深切的關切，盼望日本政府自制，希望作最大努力，以求就地解決。

在東京與華府間各有接觸的時候，中國政府亦曾請求美英法蘇四國出面調解。法國在原則上表示同意，但英政府則以日本繼續增兵，慮及事態行將擴大，並準備向中日雙方提出忠告，希望雙方有誠意停戰。美國國務院則在華府與中日大使接觸，並積極表示，願與英國協力調解。但英國政府則僅訓令駐中日兩大使，單獨向中日當局忠告，請各自制；却並未曾與美國，甚至再與法蘇等聯合採取積極調解行動，更甚至對中日施以聯合壓力，促使停戰等努力。

蘇聯當時態度別有用心，未作具體表示。

但在日本國內，對北平方面戰事採取激烈態度的『擴大派』（包括參謀本部作戰課、支那課、陸軍省軍事課、駐僑滿關東軍、朝鮮軍、及支那駐屯軍等陸軍激進派）已經逐漸壓倒了『不擴大派』（包括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陸軍省軍事課、外務省、海軍等比較穩健的派系等）竟於十一月的緊急內閣會議上，以中國中央軍北上增援

爲藉口，決定派遣三個師團增援華北，並在十七日提出無理要求如：撤銷反日機構，取締共產組織，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退出北平區域，由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向日本謝罪等。

七月十九日，蔣委員長在廬山召集全國名流舉行時局會議，當即針對日方此種荒謬要求，提出四項答覆，堅決表示維護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冀察地方組織不容變更，官員不能撤換，二十九軍駐防地區不受任何約束等有名的歷史性決定。

於是中日雙方已積極走上戰爭的途徑，美英等國在東京和南京的有限度調解，至此已趨於失敗了。

另一路『和平運動』，在敵國內也曾經曇花一現。

### 希特勒在斡旋和平

『蘆溝橋事變』後的頭幾天，敵國擴大與不擴大兩派正在爭執未決時，以不擴大派中有份量子——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長石原莞爾和內閣書記長官風見等的主動，提出議案，主張近衛首相或廣田外相請得日皇詔諭，操和戰全權，前往訪問南京，與中國政府直接談判，但近衛與廣田俱表示無自信達成交涉，予以拒絕。七月下旬，北平戰事已經逐漸擴大後，近衛首相受其側近的『支那通』的建議，以民間人宮崎龍介（中國辛亥革命前後，孫總理的日本志友宮崎滔天的公子）爲密使，欲借重宮崎家與中國的關係，前往南京側面進行停戰和議。但因事前未得陸相杉山元的

了解與同意，宮崎自神戶出發時，即爲憲兵逮捕，又告失敗。

這時，近衛首相四周的所謂『支那通』，一時在東京和上海南京活動起來，俱稱得有近衛同意，從事私下的『和平工作』，真可謂雜亂無章，紛紛紜紜，莫衷一是。

但其中却有比較正式的一股活動，爲日方稱爲所謂『船津工作』者，應予提出。

日本外務省是屬於當時不擴大派的，以東亞局局長石射豬太郎爲首，在與海軍及陸軍中的不擴大派協議下，派遣前駐上海總領事，當時任日本在華紡織同業會理事長的船津辰一郎爲代表，與中國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取得聯絡後，作成所謂『日支國交調整案』，前往南京從事談判。

當時日方提案，可分兩面：

其一爲『停戰交涉案』，要點爲：（一）取消塘沽、何梅、土秦三協定；（二）取消冀察、冀東兩政府解消；（三）設立河北省非武裝地帶；（四）撤退增派的日本軍隊等。

另則爲正式『日支國交調整案』，其要點爲：（一）承認滿洲國；（二）訂立中日防共協定；（三）取締排日運動；（四）自由通航，及廢止冀東特殊貿易等。

在日方作成此種提案之時，自以爲係在作戰中的最大讓步，除去承認僞滿外，日方放棄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在華北所獲得的既成事實。自然，此案中日方亦明知欲使中國政府承認僞滿，實爲交涉的難關。但他們已決定並不求得『正式承認』，而願以今後不再討論的變相非正式承認爲滿

足。並準備於停戰協定成立後，進行放棄『治外法權』等的交涉。

船津密使於八月四日出發，七日到達上海；適岡本總領事與甫自青島返滬的川越大使會談。而川越在接到外務省的訓令後，竟予以冷淡應付，對船津工作不表重視，而仍與中國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保持接觸。船津到了九日，才在上海與高宗武會面，但以川越大使不支持船津，頓使他與高的會談失去其意義。同時，高本人對日方此案非常悲觀，向船津表示南京方面態度非常堅決強硬，任何人如有退讓意見，即可被責罵為賣國賊或漢奸的可能。所以高當時以為『和平』甚少希望。當天夜間，高又繼續與川越大使會談之際，本來已經緊張萬分了的上海局勢，當天發生了『大山事件』。因日本海軍陸戰隊大山勇夫上尉率水兵一名，乘汽車衝入我虹口機場示威，並開槍殺死我衛兵為我保安隊激於義憤將其擊斃後，日方遂藉故不遵交涉，於十三日發動進攻上海的戰事，引起全面大戰。至此，船津工作當然又澈底失敗了。

船津工作雖然無疾而終，中日直接交涉之門暫時關閉，但此次日方提案要點，遂成為以後德大使陶德曼奉其政府命出任調解的根據。陶德曼大使斡旋『和平』的第一次嘗試，在十一月六日上海戰場全部總撤退的前三天，由德國駐日大使吐克森，與日外相廣田宏毅洽商之後，再以日方所提出的新條件，轉由陶德曼大使向我最高統帥提出，請予考慮。

日本請託德大使之前，也正當淞滬大戰方酣

之際，在十月一日由閣議決定『支那事變對處網要』，統一各方面的意見後，由廣田外相在十月二十七日邀請各有關國駐日大使，個別交換意見，並闡明日本的希望條件，希望第三國能出面作公平的和平斡旋。

當時，距十一月三日北京九國公約會議的召開僅有數日，中國政府對該會抱有莫大的期望；這時，美英對日本和平動機尚有猜疑，態度並不積極，因而與日本關係密切，又與中國國交尚屬良好的德國出面而斡旋。至於當時何以不由英美聯合出面調解，而由德國單獨出面調解？其原因可分政治經濟兩方面來說明。

在日本方面，外務省本以英美聯合調解最為適當最為有力，並以為德國在華政治經濟關係不如英美之深切，故單獨由德國來承擔，恐不易生效。可是，自從『九一八』以後，英美對日本軍人在中國的橫行，早已表示反對；蘆溝橋事變後英國停止了日英會談，美國亦有不滿日本的表示；因此日本軍閥認為英美為日本傳統的在華競爭的勁敵。如由英美出任調解，成功之後，英美必將有索取報償的可能。同時日本民間在那時已為日本軍閥挑起反英美情緒，故軍部為主，極力反對由英美出面調解。

在德國方面，戰前與中國有着良好貿易關係，且並以軍火賣給中國，此點雖為日本所不願；但那時日德已簽訂共同防共申明，關係密切，德國慮及對華大戰延長，影響日本『北進』進攻蘇聯，故願日本對華停戰。日本軍閥也願以德國代替英美，因此近衛和廣田就請託了德國。德駐日

大使吐克森與駐華大使陶德曼，在奉到希特勒的准許後，積極出面調解。首先由日本廣田外相將日方所提條件面交德大使吐克森，由其派駐日德武官攜帶此項要案，飛往上海，面交陶德曼大使轉呈中國政府。其條件已於前章列出，可謂根據『船津工作』的條件，再加一條承認內蒙古自治的要求。

### 老將宇垣出任外相

我國當時以為北京九國公約會議可能對日實施有效制裁；因之對日方所提條件，認為過於苛刻，我在有損領土主權完整下，最低在不能立即恢復蘆溝橋事變前狀態下，不能予以考慮。同時，在敵國方面隨即於十一月九日攻佔大上海，又兼九國公約各主要國未能對日實施制裁，陸軍方面遂主張乘勝進攻南京，預期攻下南京後，中國政府已至山窮水盡，非對日屈伏求和不可。

於是積極進犯京滬沿線，又從浙江進兵，圍攻南京，在十二月十三日攻佔南京後，以為迫和時機成熟，再增加條件，（見前章所述）仍然託請德大使陶德曼向中國政府重新提出所謂『新和平方案』。

陶德曼大使所傳達的日方新條件，經我政府檢討，並經若干週折後，仍予以拒絕。

一九三八年初日本政府惱羞成怒，以為現已攻佔南京，中國係戰敗國地位，日本以戰勝國地位求和，而國民政府竟不接受，遂於一月十三日所舉行的『御前會議』上，採取極端嚴重錯誤的政策，即為在一月十六日所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

交涉對相的荒謬申明，其要點稱：

『日本政府於南京陷落後，對於中國國民政府，予其以反省態度之最後機會；而至今日，國民政府依然不了解日本之真意，策動抗戰，對於東亞全局和平，毫無顧慮。因此日本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期望能與日本提攜之新政府成立與發展，而擬與新政府調整兩國邦交，並協助建設新中國。』

我政府乃於同月十八日，發表宣言，揭破並駁斥日本新陰謀，其要點為：

『中國抗戰目的，為求國家之生存，為維護國際條約之尊嚴；中國和平之願望，雖始終未變，而領土主權之完整，既為我獨立國家應有之要素，又經有關於各國以神聖之條約，允予尊重，自不能容許任何國家之侵犯。中國政府於任何情形下，必竭全力以維持中國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復和平辦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同時任何在日軍佔領區域內，如有任何非法組織，僭竊政權者，不論對內對外，當然絕對無效。』

敵國軍閥在一九三七年底攻佔我首都南京後，原以為國民政府絕對不能再繼續抵抗，陸軍省在閣議上的報告，以及杉山陸相對日皇的報告，俱以這種判斷為標的。誰知佔領南京，託請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澈底失敗後，不得已一面培植傀儡政權，於翌年三月二十一日弄出些老而不死的舊政客梁鴻志、溫宗堯、湯爾和等在南京成立『維新政府』，與北平原有的偽『臨時政府』王克敏等唱對台醜劇，以遂其『以華制華』，

分割統治的陰謀。另一方面又被迫再陷入大陸戰爭泥淖，繼續用兵。用兵的目的，初步在打通津浦鐵路，把華北華中聯成一片；再繼而南北夾擊，圍攻我抗戰重心的武漢。日本軍閥又再作一次迷夢，以為在打通津浦鐵路戰局重心的徐州會戰中，可以把中國野戰軍包圍殲滅，乘勢再攻武漢，中國即失去繼續作戰的能力，非屈伏簽訂城下之盟不可了。

敵人更不曾料到，未攻下徐州之前，在台兒莊吃了一次大敗仗，繼在攻佔徐州之後，中國大軍五十萬安全突圍，轉進至武漢外圍佈署新的抵抗陣容。

那時期，日本在中國已經動用了陸軍正規軍二十個師團，預備及後備兵役也大規模召集，甚至把原駐防偽蒙準備對蘇聯作戰的關東軍也抽調一部投入中國戰場。戰略戰鬥上，打了勝仗，也打了敗仗，戰果出乎預期的小；戰略目的『以戰迫和』更沒有達成。於是，敵國內部困難叢生。

內閣和軍部對戰爭的自信開始發生動搖，膨大的戰費，和大量軍需物資的消耗，於是造成在財政經濟上的危機，日見加深。一般國民雖然為軍閥的宣傳所惑，曾經在攻佔上海南京後大肆慶祝，陶醉鼓舞於一時的勝利；但至此對於戰爭得不到結果的前途，也發生嚴重的不安感。

近衛內閣面對這種惡劣情勢，遂着手內閣大改造，想來打開條生路；於是在五月十九日攻佔徐州後的二十六日，成立改造新內閣，以所謂不擴大派的陸軍少壯領袖之一的板垣征四郎為陸相，以預備役老將宇垣一成繼軍閥御用政客廣田宏

毅為外相，以三井財閥的巨頭池田成彬為藏相。這一個改造後的近衛內閣，其中最引起國內外不解的，是外相以預備役老軍人宇垣來充任；而且，陸軍方面還表示過強烈的反對。

於此，我們應該加以剖析。

那時期的國際情勢是，納粹德國在三月中共吞併了奧地利，捷克已受嚴重威脅。英法兩大歐洲領導國家，為了防蘇和維持和平，竟對德國忍讓，採取『綏靖政策』，於九月間同德意軸心國簽訂了有名的『慕尼黑協定』，承認了德意在歐非的侵略既成事實；即承認德國合併奧地利，並再佔領捷克；承認義國佔領阿比西尼亞等；妄想換取德意的滿足，不再前進。

日本也效法英法試行日本所謂的『融和政策』，想藉重宇垣外相來與中國的新任行政院長孔祥熙探洽『和平』，企圖進行另一次重大的交涉，其目的在拔出深陷中國大陸戰場泥淖的雙腿，免於愈陷愈深。同時，日本並企圖與英國談判在華利害的調整；因為日本既已佔領了天津和上海一帶，與外國中佔第一位的英國的經濟權益，遂直接發生衝突；日本在未決定『南進』國策之前，還想與英國妥協，平分在華的經濟權益。

近衛內閣改組不久後，日本關東軍在七月與蘇聯在偽滿朝鮮交界處的張鼓峯發生武裝衝突，參加戰鬥兵力一師團，竟為兩倍的蘇軍打敗，後以外交方式挽回頹勢，在八月中停戰。日本經此次事件，與蘇聯關係更趨緊張，更急於解決中國的戰事，以便配合與德義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羅馬所簽訂的『德意日防共協定』，準備在時機成

熟時，實行『北進』國策，與德義同時兩面夾攻蘇聯。

我們得補救出何以近衛首相要請預備役老將宇垣來担任這種不平常的外交任務呢？

### 和平交涉壽終正寢

宇垣以軍人政客姿態，在日本素有『政界之惑星』的綽號，他在近衛內閣居於諮詢地位的『參議會』的參議中——池田成彬、荒木貞夫、末次正信、松岡洋右、町田忠治、前田米藏等十幾位人物——是一中心人物，曾向近衛建議外交一元化，設置對華中央機關等要政。內閣改組以前的四月廿八日，參議會曾有決議案『為對華行政事務之處理起見，應設置對華中央機構』，建議內閣設置『對華委員會』以審議決定一切對華政策，由首相任委員長，外務、內務、海軍、陸軍、大藏、無任所各大臣任委員。參議會一決議案即由宇垣一手所主張而成立的。所以近衛內閣改組，請他出馬來辦吃重的外交，尤其是對中國謀和為最中心任務。

宇垣在就任之前，曾向近衛提出四項原則，經近衛應允後他才承擔下來的。即是：（一）內閣的統一強化；（二）外務與陸海軍分區的對華外交一元化；（三）與漢口的國民政府負責人開始和平交涉；（四）放棄堅持一月十六日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申明。附帶更要求更換陸相杉山元，以消除陸軍中擴大派死硬對華的勢力；所以近衛另以不擴大派的少壯軍人板垣為新陸相，以便與宇垣相配合，進行對中國的『和平交涉』。

當時日本國內雖然以對華外交一元化為號召，但畢竟對華在如何的條件下才能停得了戰？講得了和？還是意見紛歧參差。

宇垣外相自然是當時的中心負責人，他在就職一個月後的七月三日，在所提交陸軍方面的『關於時局外交對陸軍之希望』的文件中，曾經表示：為防共軸心強化計，日本與英國關於對華事變之解決方針之適應起見，應逐漸在華中華南之英國利益，予以善意之考慮。與美國則努力保全其在華權益，並導入美國資本。更重要者願為對中國佔領區域開發之構想，在華北及內蒙方面，由日本實際主辦其國防資源之開發。在華中則由日本與各省有關國共同實施開發事宜。

另外在外務省內部，最重要的實際負責者為東亞局長石射豬太郎和宇垣外相的討議。二人之間，對華進行交涉，頗有異同的見解。

在原則上，石射局長主張對中國的主權不能加以限制，內政不能加以干與；在此種前提之下，作成『和平』交涉的基礎條件如下：

政治方面，承認滿州國，要求確立共同防共政策。臨時維新兩政府由今後改組後之中國中央政府處理之。

軍事方面，長城南方一帶，上海四周地域設立非武裝區。華北內蒙及華中一部，日本駐兵，以一年內為限期。駐兵地點及兵力以最低限度為準。

宇垣外相對石射局長的構想，認為係尊重國民政府並不干涉內政，予以同意。

同時在敵國內，表面上號稱對華交涉一元化

，但實際並不如此。陸海軍在北平派人引誘吳佩孚大帥出而領導新傀儡政權，但未被吳大帥接受。另一方面，參謀本部的少壯軍官一直在中國服勤務的影佐禎、昭和今井武夫，却和我國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有了接觸，引動高宗武從重慶飛香港，再轉到東京，與近衛會了面，造成以後汪精衛出走求和的局面。

敵國內不但各行其是，而最著者為陸軍擴大派份子所把持的大本營，竟不顧一切，於宇垣外相正試探談判之際，在六月十八日下令總攻武漢。當時宇垣與陸軍間裂痕加深，同時與近衛間的不信任也愈來愈明顯，更為了設置『興亞院』的問題，宇垣認為阻礙他對華對英交涉的政治陰謀，已由陸軍積極展開；近衛首相態度竟至曖昧不明，宇垣在任四個月後，遂不得不提出辭呈，繳羽下台。

自然，這一次在暗中進行的正式謀和之舉，也就壽終正寢。

### 長沙大火真象如何

民國廿七年十月廿四日，從東南北三路圍攻武漢的敵軍已竄犯到漢口郊外五十華里的地帶，坐鎮指揮的蔣委員長經夫人和參謀人員的勸告敦促，才於晚飯後乘坐飛機離開漢口，飛往湖南南部重鎮衡陽。當他們的專機第一次在夜間未能發現衡陽機場再折返漢口時，已經在廿五日上午一時半。機場正在破壞，險些不能降落；等到在早上四時再從漢口起飛，以便在天明後可以覺得衡陽機場降落。那時，敵軍砲火連天，逼近漢口

只有卅華里了。

我國保衛大武漢的野戰軍，陸續向外圍撤退，轉移新防線；蔣委員長一直留在衡陽指揮，於十月卅一日在陪都重慶發表『武漢撤退告全國軍民書』後，又在十一月廿五日在衡陽召集南嶽軍事會議，將第二期抗戰軍事調整佈署妥當後，在次年一月才將其總部遷移重慶。

在未遷往重慶前，蔣委員長設立臨時總部在湖南省會長沙。佔領武漢的敵人，爲了鞏固外圍據點並準備下一次的攻勢起見，在十一月十二日便南下攻佔了武昌與長沙之間的要地岳州。

岳陽一失，長沙即受到莫大的威脅。當時，蔣委員長正在衡陽的衡山上，對於長沙的危局，曾對軍政大員有重要指示。在與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將軍的密令中，曾命其『於必要時相機破壞』。張治中主席以爲蔣委員長令他作『焦土抗戰』，在十一月十一日晚召開省府緊急會議時，竟主張在必要時放火燒毀長沙，但省府各首長則態度不一，財政廳長尹任先贊成，但民政廳長胡次威和教育廳長朱經農却堅決反對。會議上始終未得到決議，但張治中早已決定了徹底破壞的準備。十二日竄據了岳陽的敵軍又

爲了鞏固岳陽外圍，在十三日佔領了南面的新墻河，尚無大規模進犯長沙的企圖和佈署，長沙方面驚惶不安，竟謠傳敵軍已佔了新河。新墻河和新河是兩個地名，以一字之差，新墻河在岳陽南面六十華里，距長沙還有兩百多華里。新河則在長沙北面十華里。張治中主席在一員武將，竟至張惶失措，不辯情況，昧然在電話中下令以準備好的汽油，向市區縱火焚城，一時火光四起，

一座名城在一夜之間竟給燒成『一片焦土』！蔣委員長在南嶽得到報告，最初還以爲係誤傳，即令查報，居然屬實。十四那天，便親自去長沙澈查責任。張治中竟推卸責任，說是省府會議並未作此項決議，亦未曾發佈這項命令。後來，委員長將各有關軍警人員交付軍法審判，當時的長沙警備司令鄧梯、警察局長文仲孚、保安第五團團長徐崑三人判處死刑，予以槍決。



南嶽軍事會議舉行之地，自此成爲抗戰勝迹，圖爲重慶七間南嶽大殿。



南嶽獅子石，今總總統蔣公建「率舞亭」於其地。

張治中此人，自來無人格，他既不承認在電話中命令長沙警備司令鄧焜放火，鄧焜又如何取得張治中應負責任的證明？所以這三位替死鬼被槍決前，鄧焜臭罵張治中沒有人格，並辱及他的祖宗，大叫『在鬼門關等你這個無恥的傢伙算賬！』等粗語，死得不能瞑目。

『長沙大火』震驚全球，實在是中國抗戰中的一樁極不光彩的事件；三將領被槍決，雖是平除民憤，伸張政府威信，無可奈何的處置；但在抗日戰史上，無論如何是一個莫大的污點。

後來，長沙經委員長命令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將軍在南昌失守後坐鎮防守，造成三次『長沙大捷』，歡騰中外，予敵人以嚴重的打擊，可以彌補挽救『長沙大火』的各種損失，此是後話，暫且按下不題。

南嶽軍事會議後，蔣委員長將總部正式遷往陪都重慶。在民國廿七年十二月初旬，蔣委員長和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二人，時時會談，對抗戰的現況和今後，有徹底的檢討和議論。

當時的內外情勢，對我國抗戰還沒有樂觀的因素，和有利的發展。先說國際情勢：

武漢失守前的九月底，英法在『綏靖主義』的退縮政策下，已經和德義軸心在德國南部名城慕尼黑簽訂了四國協定，承認德義在歐非由侵略所造成的既成事實，並且更大大讓步使德國佔據吞併了捷克。

英國張伯倫首相力主讓步，以為就此使德義知足不前。但美國却已看清楚德義將不會滿足，必定繼續侵略擴展，西方對德義的戰爭，早遲

不可避免。因之，美政府傾其注意力和作戰準備在對付歐洲的德義，他們因之不願在東方和日本發生嚴重衝突，而採取『安撫政策』。所以當中國最初苦戰的一年中，美政府還不曾禁止商人賣廢鐵給日本充作軍用。日軍在進攻南京時派機炸沉美海軍砲艇巴納號，美政府在日方道歉賠償後也就滿足了事。

德義軸心國因早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羅馬與日本簽訂三國『防共協定』，次年二月竟不顧中德邦交，承認了偽滿；五月中又召回了在中國多年的軍事顧問團。義國也和日本有防共協定的關係，在聲勢上支持日本，對我國邦交大不友好。

### 抗戰初期鴿派人物

列強中只有一個蘇聯，在別有用心心的國際政策應用上，於淞滬大戰爆發後幾天當中，與我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並在軍事和經濟上對我作了有限度的援助，使我較有力的抗戰下去，以免日本迅速擊敗中國，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和戰略地帶來反蘇反共。

這是武漢失守後，蔣委員長輾轉退到重慶時所面臨的國際情勢，一幅黯淡的現實局面。

國內當然更艱苦。

全面戰爭已經打了快兩年，軍隊的損失犧牲，亟待整補；財政經濟，枯竭拮据，亟待外援；尤其嚴重的是，中共藉抗戰為名，發展為實，快兩年的時光中，除了在山西平型關的林彪一師算是打了一次具有政治作用的伏擊戰獲勝而外，他們早已不服從命令，再參加各戰役的戰鬥序列，主要

便在北方和中部擴展兵力，作長久深遠的打算。

中共的第八路軍早已擴充改名為第十八集團軍，乘政府軍大戰苦戰敵軍之後的撤退空隙，已經建立了晉察冀軍區和晉察冀豫軍區，並且繼續進入冀魯豫平原，毫不理會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的命令，處處不打日本軍隊，反而處處進攻地方抗日團隊和中央所指揮的游擊部隊。打敗了抗日游擊隊等，就予以收編，繼續擴充勢力。另一部以抗戰為名的中共新四軍，在軍長葉挺的帶領下，也和第十八集團軍採取同一作風，在華東地區的長江南北，不服從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命令，只願進行擴充兵力的陰謀，不擇一切損害抗戰的手段。

華北華中的中共部隊，已從抗戰初起時，不過四萬上下的兵力，在不到兩年中，竟發展到廿萬上下了。

在國際國內這種交相煎逼之下，對強大優勢的日本敵軍作了快兩年的抗戰，其艱苦卓絕，真不可以想像於萬一。

蔣委員長和汪副總裁在到重慶的那一段時期，也就是敵國宇垣外相謀和失敗，由近衛首相兼任外相並加緊在軍事上再謀進攻，在政治上採取注重『經濟開發』，企圖『以戰養戰』的長期打算，成立了『興亞院』，從事開發利用中國佔領區的資源；並且對於北平和南京的偽組織，正圖加以強化；本來想引誘吳佩孚出山，妄想造成一個統一的偽中央政權。但吳佩孚總算晚節彌堅，雖經日方多次拉攏誘惑，他看清了日本的陰謀，不會獲得真正中日間的和平，所以拒不出馬，堅

辭不就。

蔣汪二領袖在重慶的私人聚談，有幾天晚上，談到深夜不休。面對沉重的抗戰形勢，兩位領袖所憂者相同，而所考慮的辦法則相異。

蔣委員長認為仗必得繼續打下去，問題是怎樣才能打下去？爭取外援，充實軍力，主要的在苦撐抗戰到底，再利用國際形勢的演變，爭取最後勝利。自然，另一個嚴重問題即在怎樣才能制止中共的擴充政策，這是一個非常厲害嚴重的後患！

汪精衛呢？他除了對中共的擴展表示愈來愈嚴重外，又認為國際情勢如此黯淡，自己國力消耗太多，戰爭是不能打下去了。他所考慮的是怎樣才能和日本媾和，爭取到光榮的和平。

當時兩位領袖的心情，其沉重萬分是相同的，但如何渡過難關，其想法就各有所趨。但在表面上，還看不出的一幕歷史性的大悲劇已在醞釀揭幕了。

原來，中日之間，自從清末鑒於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一戰勝中國，再戰勝俄國，國勢日趨富強，而自己的康梁變法因『戊戌政變』而失敗後；朝野都想學習這一個老鄰邦的現代化途徑與方法，於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前往日本留學考察等等。

從日本留學回國的文武學生中，清末民初以後大別可以分為三類人物：其一是認清了日本維新後的趨勢，必定展開向亞洲的擴展，而其侵略的對象，頭一個便是地大物博，國勢零亂不振的中國；主張奮發圖強，對日本加以抵制，甚至為了保衛國家，和日本終歸要大戰一場。另一類則

是給日本的國勢國力炫耀着，認為中國祇有和日本『親善』相處，委屈求全，極力避免戰爭，維持兩國間的和平，免除共同的不幸。第三類人物，則主張和平固然是中國所需要，同日本和平相交，來共謀兩國的福利，東亞的復興，當然最好不過；但如日本不識大體，以侵凌政策對付中國，那麼中國被迫自衛，雖訴諸戰爭，亦在所不惜。

一批人物，依然迷夢着和日本妥協，妄想以某種限度的讓步，來換取苟安圖存。 在上述的第二類人物中，出現了一件與汪精衛以後叛國附敵有淵源的人和事。 戰前南京中國銀行分行經理吳震修是吳錫人，曾於日本明治末期留學東京，在東京帝國大學附屬的東京陸地測量部修技所卒業。後來回國加入銀行界工作，慢慢晉升到中國銀行南京分行經理。此人頗擅交際，又當選南京銀行公會理事長，國際扶輪社南京分社幹事長等職務。（未完）

# 黃在鋸木工廠

伐木 · 製材 · 買賣

黃 金 和

第一流的技術，最豐富的經驗  
提供純為客戶利益着想的優良服務

- 行址：嘉義市民生路 三 七 〇 號
- 電話：三 二 二 四 七 號
- 廠址：嘉義市博愛路 一 七 三 號
- 電話：三 六 四 七 號
- 辦事處：南投縣鹿谷鄉彰雅村中正路廿九之二號
- 電話：鹿 谷 局 六 七 號